

我的父親

陶天文

百川吾兄七秩大慶

秀毓山陰國士多，先生才美更殊科。
陳言必作千秋計，秉氣常同萬物龢。
直逾朱絲能斌媚，思調玉燭豈媿媿！
載賡樂只臺萊句，進酒頻添金叵羅。

弟
嚴家淦
敬祝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我應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擔任客座教授。多年不見父親母親，發現他們都已衰老得多了。我一再奉勸父親早日退休，他說要到七十歲再看情形方能決定。今年父親已是七十歲了，而且聽說監察委員就要增選，繼起有人，父親應可退休了。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們做兒女的，自應爲他慶祝一番。父親在八年前曾去美國住了兩年，當時就已決定七十歲一定退休，並將在美國和兒女們共度他的七十誕辰。但是現因國難更加嚴重，不便遠離祖國，一時看來不想去美國了。而父親母親的生活又是慣於簡單樸素和刻苦，所以我們縱使寄奉再多的美金，他們也不會好好的享受和慶祝。於是我們決定選印父親的著作，聊申孝思，目前先把「陶百川叮囑文存」（註一）付印。我是他唯一的女兒，乃由我代表三兄一弟（註二）寫這篇「弁言」。

二

我先引父親自己的話來開始，隨着略加說明。下面是他五十九年八月七日應大華晚報之請所寫「述事言志」文中的一段：「回憶在我小學畢業時，先父正在做『紹興師爺』，而且是刑名師爺，不是錢穀師爺。他看我頗有分析和判斷的能力，可以接他的衣鉢，所以要我跟他『學幕』，不要我和二弟一起去考中學。但是先母不贊成。她說：『二兒上學校，大兒不上學校，大兒將來

會怪我們的。」於是我們兄弟二人一同考入了蘇州一所教會學校」。

先祖父在三十八年五月上海淪陷前兩天，離開上海經香港來台灣和我們團聚。祖父最愛憐我，但我不久就去美國。上次回來，門庭依舊，可是他已去世多年了。

祖母的幾句話，對父親一生事業的影響很大。假使父親真的學做了「紹興師爺」，他可能終老於縣衙門的「刀筆生涯」。（但以父親的自強不息，他也許會效班超的「投筆從戎」）。

祖母娘家姓吳，生三子。父親居長，二叔曾任上海市立敬業中學校長，三叔曾任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系主任。她在民國九年因氣喘病歿於揚州旅次。

三

父親的「述事言志」接着提到他的大學教育：「中學畢業後，母親早逝，父親失業，我們兄弟無力升學，二人都以教書為生。經過一年稍有積蓄，並承二弟允以束修繼續資助，我乃得升讀大學英文系，那時的目的是在教書或向海關找工作。但是北伐的浪潮把我從英文大陸報的翻譯崗位捲進了民國日報和上海市黨部。並因英文對我的黨政工作沒有多大用處，我又入大學讀法律。後來用其所學，一度曾任淞滬警備總司令部的軍法處長，真的繼承了父親的『刑名師爺』的衣鉢」。

淞滬警總軍法處長真是權重勢大，在他人是求之不得，但父親祇做了兩年。他在文中有所說

明：「但我發現志不在此，仍想教書，而在大學教書非有更高學位和學識不可，於是力辭軍職，改往美國留學。抗戰前夕回到上海，被推為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的秘書長，礮火聲中書也教不成了。後隨政府退到武漢，陳立夫先生新任教育部長，邀我任該部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的駐會委員，但不久因擔任參政員而辭職」。

父親讀過三所大學，第一是東吳（大學）法科，第二是上海南方大學，第三是上海法科大學。他在南方讀得文學士，在法科讀得法學士。他在大學時期，沒有用家中一文錢，因為祖母死後，祖父無意用世，隱居鄉下，住在先叔祖家中，根本沒有自己的家，父親已「無家可歸」了。那一段很長的艱難歲月，父親怎樣度過，怎樣尙能求學，其努力和辛酸，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父親要寫一本「憂患莊敬七十年」，我預期可使「貪夫廉，懦夫立」。

四

父親在美國讀的是哈佛大學，可是時當抗戰前夕，國難嚴重，他遠離祖國，總覺於心不安，所以輟學而回。後來小哥（天放）和我都在哈佛大學讀得博士學位，未始不受父親曾讀哈佛的影響，而且也可稍稍彌補他沒有讀得博士學位的遺憾吧。

父親第一個職業是教書。中學畢業那年暑假，就被同學請到武進旅滬同學會所辦的暑期學校

去教英文。因爲成績好，被縣立第一高小校長優禮聘任英文教員。第二年任教上海養性中學，並任家庭教師。母親就是因父親爲她任英文家教而認識的。

父親與教育的關係很深。因爲他教過小學，中學，專科學校和大學。在教育行政方面，他做過高級中學的校長，教育部的專任研究委員，現在還任監察院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父親的生活，說得上是「多采多姿」，他在那篇文章中接着略提他與民意機關、新聞事業和出版事業的關係：「國民參政會是戰時的民意機關，不負實際責任，我在職七年中，陸續兼任了香港國民日報（今日香港時報的前身）和重慶中央日報的社長。後來接辦大東書局，總以爲此生不會再任公職了」。

五

父親一生的職業和事業，主要是在這三方面：一是學校，二是民意機關，三是新聞事業和出版事業。學校部份已見上述，現在略舉後二者。

父親早年就做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的參議員。抗戰第二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他擔任第一屆參政員，一直連任到最後一屆（第四屆）。勝利回到上海，他爲服務桑梓，辭去參政員，改任民選的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員，直到當選監察院監察委員。

父親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職位，就是上海英文大陸報繙譯。不久轉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編輯和主筆。上海晨報創刊後，擔任總主筆。抗戰第三年，奉派赴香港創辦國民日報，擔任社長。不久調回重慶擔任中央日報總社的社長。後來在台北任教「新聞法律和新聞道德」以及擔任台北五個大眾傳播事業合組的新聞自律組織「新聞評議委員會」的委員，都以他的新聞事業生活為淵源。

作為新聞事業之一的，還有辦刊物。父親在北伐初期辦過「向前進」週刊，「九一八」後改辦「大路」週刊，抗戰初期又辦「血路」週刊，以後接辦中央週刊，同時兼辦「國風」週刊，抗戰勝利後又辦「智慧」週刊。

出版事業方面，父親曾辦過讀者書局，國風出版社，中週出版社和智慧書局。但最可紀念的乃是大東書局。我們兄妹都鄙視商業，但父親却說，他假使不做大東書局的總經理，就不能獲得一份優厚的退職金，我們那來中和鄉的住宅和我們兄妹赴美的一部份路費！

六

我覺得我尙應補敍父親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父親二十二歲就加入國民黨。民國十六年，上海市黨部公開後，他就脫離大陸報館，轉入市黨部工作，從宣傳部的助理幹事，升任幹事，科

長，秘書，接着當選爲候補委員，委員，常務委員。一度兼任中央宣傳部的宣傳委員。抗戰時期又在中央宣傳部擔任三民主義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又調任中央黨務委員會的駐會委員。可是我現在方知「李廣難封」，父親始終沒有做過一次中央委員。

父親在經營出版事業時怎麼會來做監察委員呢？「述事言志」是這樣交代的：「民國三十六年大陸各地籌備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選舉時，我在上海擔任三個職務：一是大東書局總經理，它以承印中央銀行鈔票爲主要業務，營業發達，財源茂盛；二是上海市黨政軍會報秘書長，負責統籌上海反共『統一戰線』的協調工作；三是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員，那是我辭去七年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好爲桑梓服務的安排。所以我當時是十里洋場的忙人之一。」

「這三個職務都很有意義，我也很感興趣，所以根本不想參加立監委員的競選。後來因爲參議會同仁的敦促，（在我還在考慮的時候，徐參議員學禹已爲我報告列入競選名單了），於是我才做了監察委員的候選人。」

「我所以選擇了監委，是基於對立監委員兩種職務的了解和比較，而石達開的兩句詩：『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附註三），對我也發生了啓示作用和推動力量。」

「因爲那時國家正在危急之秋，上海竟有這樣的耳語：『守法者死，違法者富，玩法者貴，毀法者（應該是指共產黨）富而且貴』，而且有人竟引證事實認爲不能不信以爲真。我很憂急，

『莫憑赤手拯元元』，所以我才決定重回中央議壇，而以立監委員二者相較，在糾彈和制裁違法失職方面，監察委員可望有較大的作爲和貢獻，於是我就選擇了監察工作。

「我所以『出世』而又『入世』，也如石達開所說的：『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多年來辦理監察工作，任法而不任情。對事而不對人，爲公而不爲私，也就是爲想做到『不爲仇讐不爲恩』。」

七

有些人總以爲監察委員的生活是輕鬆愉快，但在父親則是辛苦憂患，枯燥寂寞。於是父親更深切覺得監察工作實在難做；他以爲作監委的必須有「三頭六臂」，方能勝任。下面是父親自己的說明：

所謂「三頭六臂」的第一頭，是仁。仁是愛，是惻隱，是同情，是憐憫。但仁到極點，也會生怨，怨人之不仁，從而打抱不平。父親「述事言志」中引用石達開的詩句，說明他何以要做監察委員，無非是：「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父親覺得做大東書局的總經理，爲自謀是最好的，但赤手何能救民！他做監委的出發點，以及多年來呼號和糾彈的動機，絕對「不爲仇讐不爲恩」（石詩），而祇是爲了仁，爲了平所不平。

第二頭是智。智是智慧，是學問，是知識，是深刻的认识，是合理的分析，是正確的判斷。

智所以知仁，也所以明仁。徒有仁而無智，祇能做一個好好先生，而不易成爲一個能幹和盡職的監察委員。

第三頭是勇。勇是勇敢，是無畏，是敢想、敢說和敢做。勇者不怕得罪人，但敢得罪自己的親友和同事的，才是真正勇者。勇者不怕攻擊壞人，但敢爲含冤的好人仗義執言的，才是真正勇者。而這些都是很難能的。

三頭之外，還須有六臂。因爲監察是「風霜之任」，天天在得罪人，容易爲人所恨，一不小心，便爲人所乘。僅有三頭是不够的。而且三頭愈好，做事愈多，招怨也愈甚，所以尚須有自衛和自保的條件，那就是六臂。

八

第一臂是自身的健全——要無私、無欲和無求。「私者亂天下者也」，有私聽則有所不聞，有私視則有所不見，有私想則有所不知。「無欲則剛」。「人到無求品自高」。自身如果不健全，不獨不配正人，而且容易爲人所打倒。

第二臂是家屬要爭氣。妻最重要，兒女也會是包袱。假使家屬奢侈浪費，或男做太保，女是

太妹，招搖拖累，家之不治，何以國爲！自身又何能站得直，說得響！不獨做不通，而且根本不敢做了。

第三臂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沒有恐怖」的自由。魚不能在沸水中游泳或生存，人的勇氣和生存能力也很有限。所以監察制度的功能祇能發揮於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因此並可想見專制時代御史制度的貢獻不可能很大。

第四臂是領導階層的賢明和容忍。貞觀之治，魏徵對唐太宗的極諫力爭，固有貢獻，但太宗如果不明治道或不能容忍，則徵等也祇好箝口結舌，甚至肝腦塗地。請看史稱：「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卽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政要》也載有太宗和魏徵的對話：「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又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

第五臂是要有二三位助理人員，一位做他的秘書，處理信件，一位做他的專員，研究問題，

一位幫他招呼選民。父親曾應美國邀請去研究議會問題，發現美國參議員自己僱用政府支薪的助理人員每人平均達十七人之多。

第六臂，也是極重要的一臂，是同人的合作和支持。因爲監察院不是首長制，而是委員制，個別的監察委員祇可提案，如果是糾正案，須經有關委員會討論處理，如果是糾舉案或彈劾案，須經監察院另派委員審查決定，甚至調查工作也須經過院派程序。所以如果不能獲取其他監察委員的合作和支持，任何個別委員不可能有多大作爲。

九

父親自做監察委員以來，對這「三頭六臂」一向都很注意。因此天天在動心忍性，戒慎恐懼，以求寡過，而同時又須自勉自強，多想多做，以求毋忝職責。但是許多事物不是他一己的主觀努力所能控制或改變的，所以他苦不堪言，再加他四年之久的耳鳴和頭痛，身心已不能支持了。我們祈求他能早日退休！

六十一年三月四日 瑞士寄寓

附註一：「陶百川叮嚀文存」，共十六冊，書名如下：一、馭變圖強之道（上下各一冊），二、知識分子的十字架，三、爲人權法治呼號，四、回國前後，五、辨冤白謗第一天理，六、監察制度新發展，

七、自由民主噏噏噏，八、道揆法守鑿鑿鑿，九、革新進步鏗鏗鏗，十、吏治政風咄咄咄，十一、反共復國喔喔喔，十二、萬利奇觀，十三、我在美蘇采風探真，十四、美國對華政策透視，十五、天下大勢老實話。

附註二：大哥天翼，現在任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二哥天宇，現在任職於美國 IBM 電腦工廠，小哥天放，現在任教於美國海軍大學，小弟天林，現在任職於交通部運輸計劃委員會。

附註三：石達開原詩如下：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贖贖，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百川附註)七十不能言壽，而以我生活習慣的簡單樸素，即使能活到八十九十歲，我也不肯慶祝如儀。所以事前知道我的七十誕辰而承道賀的，不過十人左右，嚴副總統便是其中之一，可見他的精細和關切，彌深感佩！詩中過獎殊不敢當。其中我最喜歡的，乃是「直逾朱絲能嫋媚」，因爲這正是我在惕勉的。

後來張鏡影先生知道了，親寫一聯相贈，稱讚我：「等身著述中西貫，壽世彈章涇渭分」。上聯自係過譽，下聯則差可自慰。

我曾學寫詩，更喜歡看詩，但因不會做，很少人以詩相贈，有之祇有許紹棣先生一人而已，現在把它恭錄於左，以當絃葦：

烏夫先生鐵作肝，文章還復起波瀾。老來猶有憂時嘆，長共松杉鬥歲寒。

時代動向與國是重點

鞏固七大地位知變馭變用變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旣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知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呂新吾：呻吟語

變的特質

這是一個多變的世界！這是一個大變的時代！舊秩序已不能維持，舊觀念已不能適應。如要生存，必須預知變化，因應變化，進而駕馭變化，利用變化，於是本身也須求變求新。

因為現在的變化，不僅是量的變化，尤其重要的是質的變化；不僅是過去所累積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突然而來的；不僅影響於一隅，尤其重要的是波及於多處；不僅是以算術級數在演進，尤其重要的是以幾何級數在飛躍。

惟有認知，尤其要預見，變化的性質和影響的嚴重，而後方能憂勤惕勵，莊敬自強。但是尚須追溯和了解變化的由來和走勢，而後方能對症下藥，善為因應和利用。

然則現在的變化究竟怎樣成爲這樣大的氣候呢？源頭複雜，原因繁多，請看尼克森總統的說法。本月二十七日他在紐約每客一千元的籌款宴會中坦白的說：「我們改變了世界」。他並繼續預告：「但是我們僅在開始，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這話並不自誇，也不自諱。如說現在的變化是好事，他是開風氣之先，如說它是災禍，他是始作俑者。

變的趨勢

尼克森以及抱同樣見解和走同樣路線的其他國家的負責人，有一個根本的想法，就是因爲核子恐怖的平衡，戰爭不可能用作解決爭執的工具，而須代之以和平的方法，因此不能不走上談判

之路，而進入談判時代。

但是談判或和平解決，談何容易，所以世界尚有變化。仍用尼克森在另一次演講中的話來說明。他在本月二十五日對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聯合年會指出：在這個歷史性的偉大運動中，「參加這個集會的有經驗的人士不致幼稚的期待許多分歧都會輕易解決。我們預見因為人類和國家各有不同的利益以及對於生活和思想的不同想法和做法，可能的衝突自將追伴着存在」。

他接着例舉三種可能：

一、「因為大國間軍事衝突危機的減少，經濟衝突的潛在性就增加。」

二、「因為和平可能性的增強，戰後把我們聯結起來的同盟紐帶就變為軟弱。」

三、「因為世界各國的經濟力量都在增加，商務的接觸就與分歧的可能相因相乘。」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美國財政部長就向那個一百二十四國的聯合年會提出國際貨幣改革方案，逼使日本減少國際貿易順差或將日圓再度升值，而使東京大感震驚。

試測四種變化

我的學力和時間，不可能就世界變化的來龍去脈詳細指陳，現在祇就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提出幾個假想（我說的是「假想」），以供參考：

一、世界變化的導因之一，是毛共對蘇聯做了狄托，尼克森於是就對毛共加以安撫，以期擴大蘇毛的裂縫。但是蘇聯與毛共因為種種「認同」，未始不能言歸於好。另一種推測是說蘇毛之間可能發生毀滅性的戰爭。我不排除這二者的可能性，但我毋寧相信前途仍將如目前這樣不戰不和的僵局。

二、蘇毛的對峙和僵持，對毛自很不利，它已導致了內部的權力鬭爭和對外的政策混亂。尼克森的北平訪問，雖然替毛打了強心針，日本的背我親毛，雖然又向它進了一些維他命補藥，但也可能格外加深和加強蘇毛的對峙，甚至加速蘇聯對毛的清算鬭爭。加以共產統治不得人心，內部鬭爭方興未艾，臥榻之旁又有我們俟機反攻，所以毛周政權隨時有突變和瓦解的可能。

三、日本和毛共的親近，當然不利於我，但更不利於日本。日美關係可能疏遠和緊張，日蘇關係更無改善的可能，而因日本對我的忘恩負義，背信圖利，賣友求榮，必將為世界各國所鄙棄，它的商務關係和經濟大國的地位必將蒙受重大的損害。而且將來政府改選結果，左翼分子可能奪權，聯合政府則已在望，前途不知將亂到和糟到什麼樣子。

四、最近美國是否會有什麼變化，自將取決於大選。近來尼克森當選連任的展望很光明，他當選以後的外交政策，比麥高文的可望穩健而不致再有重大的「震撼」。但是美國的選情向難預必。本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突出奇招，宣佈支持麥高文，摒棄尼克森，指責後者祇圖便宜，

不講原則，更沒有基本哲學，一切都是以當選為本。如果麥高文當選，他的「震撼」可就大了。

七個關鍵地位

因為交通的便利，地球已經變得很小。因為國際間各國互相依存的關係太密切，一隅的「震撼」，可以波及全球。尤其我國的四周，如上所陳，兩年來已經成爲美國、蘇聯、日本和毛共角逐的中心，而我國且又成爲中心的中心，地位從而日益重要，所受的衝擊和試煉，也將特別嚴重而敏感。我們必須應付不斷的變化，進而馭變、用變和求變。

這是我們的苦難，但也是我們的機會。如何遇難成祥，必須具備偉大的力量和強固的地位。而我們是具有這樣的力量和地位的。其中具有關鍵性的，共計七種。總統指出了最重要的兩種，我試指陳其餘五種。列舉如下：

- 一、地緣的政略地位；
- 二、政治的心理地位；
- 三、飛潛的攻守地位；
- 四、均足的經濟地位；
- 五、知識的權力地位；